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第二卷)

——在上帝与尘世之间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G6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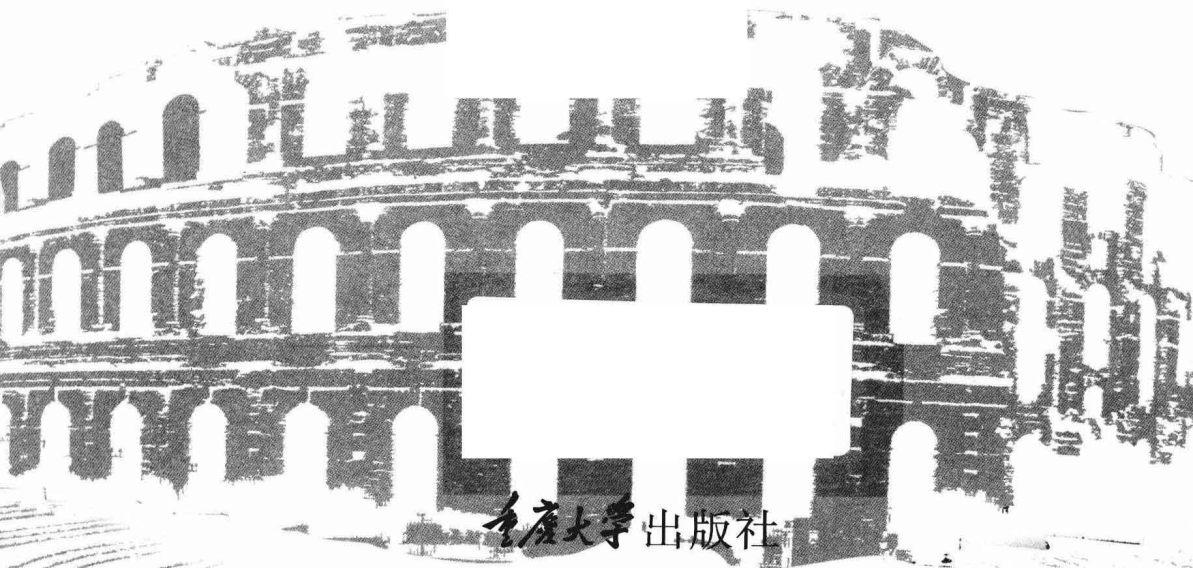
2
12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在上帝与尘世之间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在上帝与尘世之间/(英)拉斯达尔(Rashdall,H.)著;崔延强,邓磊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第1辑)

书名原文: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ISBN 978-7-5624-5915-6

I. ①中… II. ①拉…②崔…③邓… III. ①大学—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①G64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9610号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在上帝与尘世之间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策划编辑:林佳木

责任编辑: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2.75 字数:172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915-6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起源	1
第二章 巴黎大学与托钵修会	44
第三章 巴黎大学的宪政制度与大学特权	79
第四章 巴黎大学的学习	101
第五章 巴黎诸学院	132
第六章 巴黎大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159
本卷术语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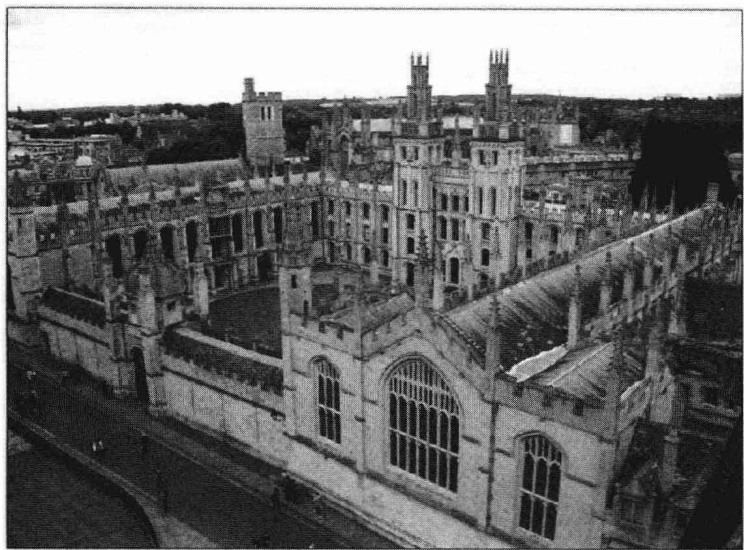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起源

巴黎大学的兴起

有关将巴黎大学的建立归因于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的神话,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早就应当被彻底抛弃,哪怕是出于驳斥的目的,也不应当再抛出这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无论是查理大帝以及光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的宫廷学校,抑或阿尔昆和司各托的学者院校,基本上都不太可能将自己的建校地址选择在 Lutetia Parisiorum^①。上述这些中世纪的学校,基本上自成立之日起便随着君主或创始人的行踪而四处迁移。这一现象与英国古代的“移动”法庭颇为神似。并且,如果上述学校曾经确立了一个固定的寓所,他们也更有可能选择亚琛^②而不是巴黎。事实上,将早年的查理大帝宫廷学校与后来的巴黎教会学校混为一谈的做派,只是一个多年来一直珍藏在法国国民心中的历史误解所自然衍生的副产品——法国人民总是认为法王创建了日耳曼罗马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并认为他在巴黎确立了自己的

① Lutetia Parisiorum,前罗马时代的高卢罗马城镇名称,后来该城在梅罗文加王朝(Merovingian)统治期间得到了重建,并由此成为现今巴黎城的前身。——译者注

② 德国最西端的城市亚琛(Aachen)位于欧洲大陆的正中央,自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就已经利用这一块温泉地区了。后来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法兰克人迁移并定居于此,并把它命名为亚哈(Ahha),在他们的语言中,Ahha是水的意思,这个城市作为温泉疗养地至今仍非常有名。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非常喜欢亚琛,他把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定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大部分晚年时光。在中世纪时期,卡尔大帝统治着大半个欧洲,而亚琛作为帝国的首都,是其权力的中心,因而也被一些人称为“欧洲的摇篮”。——译者注



巴黎大学

首都与宫廷。

至于查理大帝与光头查理的宫廷学校与后来巴黎大学的唯一联系,仅存在于法兰克王朝的修道院学校与主教学校复兴时期。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业已给予了充分的介绍^①,因而在此便无需赘述。事实上,在查理大帝时代之前,不列颠诸岛的学校教育远胜过欧洲大陆任何地方的学校教育。而从来自约克郡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应查理大帝传召进驻法兰克宫廷学校之日起,欧洲艺学和教育的重心才开始从不列颠转移到法兰西。巴黎大学系统的某些表征的确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曾经做出的贡献。首先,巴黎大学具有浓重的教会性格——该大学不仅由教会权力机构进行督导,并且还几乎完全将学者身份等同于教士神职。除此之外,巴黎学校(Schools of Paris)^②的教学传统最终也是来自于阿尔昆和苏格兰人约翰(John of the Scot)的学校。不过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巴黎学校并不是唯一继承了加洛林教育道统的院校。在查理大帝时代与12世纪这段黑暗时代的全部岁月里,总有那

① 详见第一卷。

② 此处的巴黎学校指的是尚未形成大学之前,以及大学形成后未被纳入其中的教学单位。如教堂学校,修会学校等。——译者注

么一些修道院,或者一两所主教座堂,驻扎着某些声名显赫的伟大教师。他们的光辉吸引着远方的学子前来进行知识的朝拜,这个阴郁时代晦暗、陈腐的旧式知识与传统神学教育,在那些伟大教师的教学下也能够散发出一丝丝求知热忱的光芒和思想争鸣的火光。出于自娱自乐的动机,巴黎大学的历史学者曾试图探寻本校教师与学生的经院谱系——或者说,他们在梳理自己的学术承继。为此他们将阿尔昆与阿贝拉尔(Aberlard)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推测,查理大帝与法国大学或许才能够建立起一点点细若游丝的关联。在查理大帝以及光头查理的时代,没有人曾听说过所谓巴黎学校的任何故事。图尔斯(Tours)、富尔达(Fulda)以及兰斯(Reims),这些城市都是早在巴黎扬名之前便已经成为欧洲的教育中心,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出产过中世纪欧洲教育史上的重要教师或杰出学者。

事实上,巴黎见诸历史的第一所学校,是公元9世纪末学者欧塞尔的雷米吉乌斯(Remigius of Auxerre)建立的^①。但是,即使巴黎大学某位对母校历史沉醉不已的研究者极为勤勉地一头扎进母校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恐怕也至多只能搜寻到两三个曾经于公元9世纪或10世纪在巴黎任教或求学的教师或学者。这些教师、学者的名字分别是:雷米吉乌斯的门生奥多(Remigius's pupil Odo),后来的克鲁尼男修院院长(Abbot of Cluny);来自弗洛里的经院学者艾伯(Abbo, the Scholasticus of Fleury);另外还有一位来自列日的胡克鲍尔德(Hucbald of Liege),他曾于公元972—1008年在圣热内维耶夫的学校任教。甚至直到11世纪中期,法国学校见诸历史记录的教师和学者依然寥若晨星。不过此时巴黎学校似乎开始能够吸引一些来自远方的学者,如英国人斯蒂芬·哈丁(Stephen Harding),后来的西多会男修院院长;以及布里多尼人罗伯特·阿布里斯塞乐(Robert de Arbrisselle)。当然,此时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巴黎的修道院有着学校的存在,甚至连极少数的隐喻也无法找寻到。至少从休·卡佩(Hugh Capet)统治期间,当斯堪地纳维亚海盗的劫掠不再那么猖獗的时候,律修会男修

^① 欧塞尔的雷米吉乌斯(Remigius d' Auxerre,公元908年卒),中世纪哲学家。曾任本笃会圣日耳曼修道院院长,在巴黎、兰斯、欧塞尔等地学校任教。对自由七艺、古典作品、圣经、博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等作有评注。(转引自: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第64页)。——译者注

院便已经开始取代“黑铁时代”(Iron Age^①，即所谓的堕落时代)的那些世俗篡位者的位置，为公众提供中世纪的教育，从而使得闲适的求知生活在教会开始变得可能。不过，我们亦十分清楚，此时的巴黎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欧洲教育的绝对中心，甚至连其中之一都算不上。雷米吉乌斯是记录中唯一一位曾经在巴黎任教的著名教授，而根据史料记载，他与巴黎的缘分也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直到11世纪末期，前往巴黎求学的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汇聚成一条条朝圣的溪流。《法国艺学史概论》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及雷米吉乌斯兴办的学校，并称赞其为“巴黎大学的第一个摇篮”。毫无疑问的是，雷米吉乌斯的学校肯定与某所修道院或寺院密切相关，或许这所修道院就是圣日耳曼德布雷(Saint-Germain-des-pres)。但就本质而言，巴黎大学诸学校还是属于世俗范畴的。在11世纪末期之前，巴黎唯一见于历史记录的世俗学校就是圣热内维耶夫。这所学校在12世纪时被律修院修士所控制，而其最初也和巴黎大学的兴起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事实上，巴黎大学应当算是巴黎主教座堂学校衍生出来的产物，而这所学校直到11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仍未获得哪怕一丁点微乎其微的声名。教育活动的主体从修院僧侣向在俗教士的转换，是11世纪教育大改革的标志之一。而从这一变革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寻到

① 在古希腊著名史诗作家赫西俄德所著的神史诗《工作与时日》中，以神话的形式将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五个种族和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表达出了一种朴素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赫西俄德认为，黄金时代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代人类，这代人和神一样无忧无虑地活着，不会衰老，终生都在享受着盛宴和快乐。当他们死期来临之时，他们便安详地长眠。当命运女神判定黄金时代的人们应该从地上消失时，他们都成为仁慈的保护神。他们踏云来去，奖善惩恶，维持正义。后来神又创造了第二代人类，即白银时代的人类。他们在外貌和精神上都与第一代人类不同。他们从不节制感情，行为放肆，对神不恭。宙斯非常不悦，决心要从地面上消灭这个种族。当然，这个种族也不是一点道德也没有，所以他们还是获得恩准，在生命终止以后，可以作为魔鬼在地上游荡。天父宙斯又创造了第三代人类，这就是青铜时代的人类。这一代人跟白银时代的人又完全不一样。他们残忍而暴虐，只知道发动战争。他们不愿吃田间长出的果实，而是专吃动物的肉。虽然他们长得高大威武，却无法抗拒死亡。他们离开晴朗光明的大地之后，便堕入阴森可怕的冥府。当这一代人也完全死去后，宙斯又创造了第四代人。这一代人依靠大地的丰产来生活，他们比以前的人类更高尚、更公正。他们就是古代那些半神的英雄们。然而最后他们也陷入了战争和仇杀，当他们在战争和灾难中结束了生命后，宙斯把极乐岛分给了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居住和生活。他们在那里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黑铁时代是人类的第五代。按照希腊神话的描述，黑铁时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道德、伦理、知识都进入到一个非常低的层面，战争四处蔓延。——译者注

大学运动的内核。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溯源至巴黎大学诞生的摇篮,事实上其并不是雷米吉乌斯任教的学校,而是巴黎第一位有史可循的主教座堂学校教师、第一位在经院哲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印迹的巴黎教师香蒲的威廉所兴办的学校。毋庸置疑,直到香蒲的威廉所处的时代,巴黎的学术声誉才刚刚能够与贝克、图尔斯、沙特尔和兰斯相匹敌。不过仅仅半个世纪之后,后来居上的巴黎便超越了自己的对手。正是在香蒲



阿贝拉尔,P.

的威廉的门生和对手——伟大的中世纪经院学者阿贝拉尔手中,巴黎学校终于成为欧陆学子趋之若鹜的学术圣地,在此后的中世纪历史上都闪烁着不朽的学术光环。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丝毫不愿耽于空想的历史学者而言,将巴黎大学的起源归结为阿贝拉尔的教学活动仍然是一种不严肃的行为。当然,毫无疑问,阿贝拉尔是当时智识运动最杰出的代表,巴黎大学的起源最终也一定能够归结为欧洲智识运动的大复兴。但是,阿贝拉尔任教学校的组织建构却无法与其他的主教座堂学校区分开来。在阿贝拉尔的时代,为数甚多的杰出教师都在此类主教座堂学校任教,并使得其中的很多学校一时名声鹊起。在阿贝拉尔的时代,巴黎有三座或多或少是由于他们的学校教育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教堂。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巴黎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其学校由著名的香蒲的威廉来主持;其次是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热内维耶夫牧师会教堂(Collegiate Church);还有就是同样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维克多律修会教士教堂(Church of the canons Regular of S. Victor's)。其中圣维克多律修



会教士教堂学校在香蒲的威廉遁世隐居后,开创了招收教会外部学者的先例。在以后的岁月里,圣维克多便成为旧传统或正面神学(the old traditional or positive theology)的大本营,盛产当时蒸蒸日上的辩证法或“经院学派”神学学派的伟大反对者——譬如圣维克多的神秘论者亚当、休与沃尔特等。然而早在巴黎大学组织建构的原型问世之前,上述学校已经停止开办,或者是终止了招纳世俗学者的办学方式,因此它们对于大学的发展并未起到实质性的参与作用。对于巴黎仅有的两所世俗学校,阿贝拉尔都曾一度与它们有所关联。而正是在圣热内维耶夫世俗学校教授“自由博艺”期间,阿贝拉尔的教士吸引了最庞大的人群前来聆听。而圣热内维耶夫“山峰”,也一度成为欧洲最声名卓著的教育中心。但至11世纪末期的时候,圣热内维耶夫的外部学校却开始出现了倾颓的趋势,当然,此时还远远未到全面崩溃的地步。1147年,圣热内维耶夫教堂的管理权从原来的世俗教团手中转移到一伙来自圣维克多和圣马丁教堂的律修院教士手中。自此之后,虽然在圣热内维耶夫“山峰”依然能够找寻到一些关于外部学校的踪迹,但毫无疑问,1147年的变革已经使得世俗教师受到了排斥。从此时起,直至12世纪初,主教座堂似乎成为巴黎世俗人士能够前往求学的唯一教育中心:只有从圣母院院长(即巴黎主教座堂主事)手中,大家才能获得从教资格认证。12世纪20或30年代,我们才再次发现有些世俗教士跨过塞纳河前往圣热内维耶夫男修院治下的学校任教。根据德尼弗勒神父的传统观点,巴黎大学的起源应当是介于圣热内维耶夫的人文博艺学校以及圣母院神学学校二者之间的某种结合。现在看来,德尼弗勒神父的观点显然有些脱离历史资料所呈现出来的情景,但总体而言,神父认为主教座堂学校最终发展成为巴黎大学的说法还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由于阿贝拉尔所获得的卓越声誉,才使得巴黎的街道上汇聚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而大批学生的到来又使得巴黎教师的数量成倍地增长,从而最终构成了大学的雏形。在此种意义上,也唯有在此种意义上,巴黎大学的起源才能够与以阿贝拉尔为名的时代联结在一起。作为一所大学或一个获得了认证的教师社群,我们不曾听说巴黎大学有任何与阿贝拉尔的学校的联系。不仅如此,作为某个教

堂内部或外围的学校,这样的机构也不可能一度仅拥有一位正式教师,而且这位教师是来自隐修学校,是独立于巴黎教师群体之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阿贝拉尔时期的某些巴黎学校,的确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学校纪律和组织建构,存在着某种经院意义上的普通法,后来它们形成了巴黎学术政体的基础。

自查理大帝时期的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的教育是如此彻底地局限在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以至于教会明确颁布的有关教师资格认证的法律法规变得没有什么必要。在那个各个教堂一般只拥有不超过一位教师的年代,这位教师的身份有可能是教士社团的一员,也有可能不属于这个团体,一切皆因具体情形而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任何由主教或修院院长下派而来的教堂成员,只要拥有一定的执教能力都可以随时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一批前来求学的学子。而如果教堂里确实没有一位教士能够胜任教育学生,那么教士们完全可以随意雇佣一位四处游荡的游方学者前来任教。但11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主教座堂学校对教师身份的要求有了新的倾向——他们必须是主教座堂的正式成员。上述变革大概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完成的,一种渠道是赋予“掌校教士”以新的尊严和荣耀。另外一种渠道就是将主持学校事务的责任附加给一个本来已经存在的机构——南欧教堂学校的管理通常是掌校教士(magiscola)、教堂牧师团主事(primicerius)^①或教堂诵经教士(precentor)^②等管理者的附加职责,而在北欧则是主教座堂主事的份内之事。教堂主事最初的职责大概有些类似于王室大臣,一般而言只是掌管主教座堂宗教团的印章以及负责起草需要加盖印章的信件或公文。而理所当然的是,在当时负责上述职责的教堂主事必然需要拥有相当渊博的知识,因此自然而然他们也就逐渐开始主持学校和图书馆的工作。但是,当牧师会学校负责人被赋予了明确的教会身份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学校负责人自身越来越不具备教师特质。事实上,他们只需要为那些意图求知的学子任命教师,并让那些负责教学的教师听从自己的指挥便可以了。如果学校负

① 教堂牧师团主事,源自拉丁语,系罗马帝国统治后期和拜占庭时期教堂管理部门首领的专有头衔。——译者注

② 诵经教士,主管修道院的图书室,负责抄录经文。——译者注



责人自己坚持负责神学教学的话,那么关于文法与辩证法教学的任务便会委任其他学者担当。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对唱诗班男童以及贫穷学子的基础指导,教堂学校的名义负责人通常也都会委任一些定期领取薪酬的学者进行负责,而自己只需要对负责具体教学事务的学者进行监督。然而随着12世纪欧洲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集聚在最富盛名的大教堂周围。他们渴望能够获得教会的执教资格许可,从而招收一些能够为他们的教学支付报酬的学生。如此一来,经院学者以及教堂主事便经常将正式的教学许可授予其他教师,以便于他们在大教堂周围自行开办学校并通过自己的教学维持生计。1138年,我们发现伦敦的一个地方议会明令禁止不断攀升的出售教学许可的不良风气。针对大教堂学校相关负责人滥用颁发执教职权的现象,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教令的颁布,以及稍后举行的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the Third Council of Lateran)对此问题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从此以后,不仅教堂学校的主管教师禁止通过执教职权(此时的教学许可已经正式命名为“执教职权”)的授予向申请教师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或报酬,而且他们还必须向所有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申请人授予执教许可。从此以后,教堂主事便不再是财源滚滚的教育垄断者,而仅作为鉴定执教资格申请人是否胜任的评判者,我们常常对他们采用另一个称呼——来自教会的学监。

综上所述,共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共同构成了法国教育系统的基础:一方面是对教堂主事的总体控制,另一方面则是有竞争力的教师对于执教职权的无偿占有。而其中教堂主事对于教育的控制明确地将法国教育系统同早期的意大利教育制度区别开来——如果没有教会势力的介入以及相应特权的获得,教师大学永远都无法成长起来。

一旦被确立了无偿获得执教职权,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成倍增长的教师与著名教堂学校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只要有著名教堂学校的地方,其周围自然会聚集起一大批雄心勃勃、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教师的学子。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是教师数量倍增的地方,也都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某些职业惯例和不成文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上述职业惯例与不成文法不久之后便具体整合到某个组织化

的行会或法团章程中。

在当时,任何期望成为教师的人都需要首先在某些比较权威的教士们的指导下度过一段足够长的求学生涯,否则便无法获得执教权。上述习俗业已明显成为一种原则性的存在,以至于甚至不再需要正式的授权法令。只有得到前任教师的认可和赞同,期望成为教师的学者才能够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这已基本成为教师职业的一则自然规范。在阿贝拉尔的时代,我们发现上述原则即使没有被确立下来,也应当是行进在被正式认可的道路上。在前文中,我们已见证了那位著名的伦理学者如何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一个独领风骚的神学学者(这里指的是阿贝拉尔)。在转而进行其他系科的教学之前,他必须先要投入该系科的一位教士门下。而这位伦理学者在尚未完成自己的学习生涯以及获得导师的许可之前,便冒天下之大不韪,自行开设有关《以西结书》课程讲座,这种置教师专断权于不顾的行为不仅被大家视作一种无礼举措,实质上更是在挑战教会权威。正是由于自己的莽撞行为,阿贝拉尔被迫离开了拉昂(Laon),并且这一行为还在苏瓦松主教会议上作为一项单独的主题被指控。阿贝拉尔就此事受到的指控并不是在未取得教会颁布的执教资格之前便从事教学活动——尽管这一行为在当时也是违反法律的,而是被指控为在“无任何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授课。在此处,阿贝拉尔有关《以西结书》的讲授似乎被视作一种正式、公开的就职讲座,后来不久这种行为被称为“就职礼”。但是,由于缺乏一位正式教师的主持,因此阿贝拉尔的就职讲座便是非法的。后来,正式教师的主持在实质上成为就职礼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至于类似的教师就职讲座到底需要何种程度的伴生仪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则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以肯定的是,教师就职礼上的某些伴生仪式传自远古的风俗习惯——似乎在古罗马世界的哲学与修辞学学校里,那些因为年代遥远而面目不清的古老传统被部分地传承了下来。在此方面,我们在本研究的第一卷中已经见识了意大利教师入行仪式的相似建构。事实上,法国教师的“初晋(principium)”或“就职”,与意大利的“公试(conventus)”在实质上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我们必须明晰这一仪式的内在蕴意,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巴黎大学的组织理论。也正是在教师“就职礼”这一习俗的



基础上,教师大学最终得以显山露水。

巴黎教师就职礼具有两个方面的主体要素。一方面,是刚刚获得从教认证的新晋教师在公众面前首次正式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罗马法理念,这实质上正是一个组织对新晋成员进行公开庄重的授予职务的真正仪式;另一方面,是新晋教师曾经求学的老师以及本行业其他教师对其进行认证——也就是新来者被接纳到教师群体的过程。届时,新晋教师将会头戴一顶四方帽。在古罗马仪式中,头戴四方帽有时被解释为正式从受支配状态的学生身份中被解放出来。不仅如此,学位帽(biretta,即四角帽)同时也是教师身份的象征。同样作为教师法团的徽章还包括戒指和一部打开的书籍,届时这些象征物都会由当年的老师颁发给新晋教师。然后,当年的老师还会对新晋教师致以吻礼和赐福祈祷。接下来,新晋教师将会前往主教座堂权威机构领取自己的身份签章。为了展示自己的执教能力,他还需要举行一场就职演讲或辩论。初入行者应当“为立足而支付报酬”,这一理念几乎就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本能。因此,新入行教师的就职礼实质上还包括另外一项内容——就职人必须举办一场晚宴盛情款待全体或大多数同事。除此之外,手套和长袍等礼品也是必不可少的。逐渐地,甚至每一位成员在新晋时除为同事提供礼品外,还要被勒索上一笔现金以作为教师群体的公共基金。而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一度成为大学学位授予仪式必不可少的伴生物。不仅如此,甚至那些大学所有例行的公事和正式的手续都需要当事人慷慨解囊。以上做派在最初纯粹就是一种闹剧,丝毫不比后来那些教师们试图用尽一切可能的处罚方式消灭的,流行在学生入学程序中的某些时而残忍、时而愚蠢的举动更有尊严或更为重要。而那些令人头疼的新生入学闹剧,时至今日依然存留在巴黎那些不入流的学校或艺术工房中。

抛开上述入行仪式,我们发现教师行会或法团的兴起基本上与其他行业的行会或法团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逐渐地,或者很可能是通过一些难以察觉的步骤,教师就职仪式开始从原来仅仅作为友好同事之间的欢娱,发展成为庄重、正式的新晋教师准入机制。而此时的教师公会也最终变得组织严明,并全权负责教师晋升事务。不仅如此,教师公会还迅速而成功地取得了教学事务的垄断地位。自此之后,

“就职礼”便成为与获得主教座堂主事颁发“任教资格”一般不可或缺的程序。而那些即使已经获得主事颁发的任教资格的学者,在举行“就职礼”之前,仍不能被视作具有完整身份的“教师(master)”或“博士(doctor)”。

除教师就职礼外,另外一个中世纪的伟大习俗——骑士制度也具有相似理念。骑士头衔最初的行入概念,也是新手在一个庄重的场合下被骑团的兄弟们正式接纳。就像见习学者必须获得主教座堂主事的资格认证一样,见习骑士也需要获得牧师的祷告赐福。获得主教授予的教师资格认证者还要通过资深教师的莅临和默许,才能获得完全的教师身份;而骑士申请人也要在亲吻老牌骑士的长剑后才会被骑团兄弟接纳。以上两种伟大的习俗最初都源于参军仪式,而学者生活则相对更加受到当时特有的社会、政治理念——一种行会理念或相同从业者宣誓为兄弟关系的理念——的影响。在后来的学位授予典礼上,大学的毕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视作是一种精神和知识领域的骑士制度。在后世西班牙的一些大学中,新晋博士在授位仪式上甚至还被授予一把真实的长剑;而在维也纳,骑士初晋仪式上初步进行的受洗程序,似乎同样也被学位申请仪式所模仿。

在紧接着阿贝拉尔开设讲习的下一个时代,巴黎的学者群体几乎是突如其来地升至欧洲学术界独一无二的位置。当时的主教座堂或大修道院学校,尽管学生的数量极其庞大,但他们皆将自己的名誉寄托在一两个杰出的教师身上。而此时的巴黎却已然成为一座教师之城,也是中世纪世界上第一座为人称道的教师之城。换句话说,巴黎已经拥有了形成大学的原料。在当时的行会时代背景下,我们毫不怀疑巴黎城众多的教师一定会形成某种形式的行会组织,至于巴黎城松散的教师组织具体是在何时通过一种职业性的规范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社群,我们则实在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就此事事件所有曾经给出的具体时期,实质上都是具有误导性质的臆测:因为巴黎大学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一步步逐渐成长起来的。我们只能去关注少数能够阐释大学发展历程的事实记录,然后再见证教师职业的不成文习俗逐渐转化成正规的章程或得到法律的认证,最终在13世纪初期这些不成文规范的消失达到顶峰。1127年,巴黎主教与主教座堂宗教团

联合发表声明,命令只有隶属于主教座堂机构的成员才可以借宿在隐修院中。这一声明似乎标志着一个学科研习所业已从隐修院学校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由于教师人数的剧增,不仅隐修院已经无法容纳,甚至巴黎城岛之上、主座教堂高墙之内的区域也显得过于拥挤了。我们也听闻由圣母院主座颁发执教许可的教师,开始在位于塞纳河桥上的屋舍里从事教学活动。与此同时——大概是将近12世纪中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所著的作品中查询到一则记录,就是主教座堂和圣热内维耶夫山周围的教师同时在成倍增长。在此时期有两则荒谬的传言——一则是谣传格拉蒂安(Gratian)曾蓄意“伪造”学术学位,另一则是风传伦巴第的彼得将意大利的制度转移到了巴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则传言大概都可以视作对一种既成事实的佐证——此时期那些无意致力于教育职业,或者说是无意永远致力于教育行业的人们,也开始设法获得教席荣誉。上述对于“学位”的追捧愈加热烈的推论,对人文博艺学院而言尤其重要。前文中我们业已见识了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身处的时代,人们对文法与修辞的教学和研习几乎如同对待神学一般郑重而真诚。教师们都是成熟的学者,他们视教育为自己一生的工作,学生们也将自己的学习生涯延伸到一段很长的时期。但是,12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希望从学校毕业的渴望愈发强烈,同时经院哲学与经院神学也激起了大家异乎寻常的热情。在上述两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拉丁语普通课程的研习被削减到最低限度。获得哲学教师席位,成为每一个胸怀大志的学生自然而然的追求,同时也成为进入高等系科深造的前提条件。教师数量的大量增长,尤其是非常年轻的教师的大量出现,正是促进大学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12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学者团体已越来越多地频繁地被认可为一个独特的特权阶级。总体而言,北欧学者团体获得特权的基础与意大利大学学生特权的来源是不同的。在意大利诸城,学者团体被视作一个既不同于寻常世俗人群同时又区别于神职人员的独立阶层。他们的特权基本上是通过与城市商定的协约而产生的。而在法国的教堂学校,所有的学生,甚至所有的教师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作神职人员,并如同一大批为教堂提供服务的教堂附属人员一般——虽然与教

堂相隔甚远——享有一切正式神职人员所能够获得的教会赦免权。因此,巴黎学者在教会法庭之上的审判豁免特权的缘起,便无任何世俗权威部门或宗教权威机构的确切认证。早在巴黎大学崛起的很久之前,这种特权便已自然存在。当腓特烈一世向博洛尼亚颁布了准许教师对自己的学生施行特别审判特权的政令之后,一些与此类似的尝试似乎也曾被引荐到巴黎大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经过兰斯宗教会议的争吵,亚历山大三世命令巴黎市民应准许所有的学者都由他们的教师进行审判,而巴黎大学最早获得的教皇谕令——1215年教皇谕令——也重申了这一学者特权。但是就此特权,年纪尚轻、为数甚众而又缺乏法律经验的人文博艺学院教师形成的审理系统不但在巴黎完全无法正式操作,而且在博洛尼亚也最终分崩离析。博艺学院教师的审判权迅速被普通教会法庭,以及由于大学的发展而在下一世纪被召唤出来的特别学术理事会所取代。除审判豁免权之外,巴黎大学的师生们大约在12世纪末期还获得了另一项值得一提的特权。据说,法王路易七世曾正式承认巴黎教师具有合法中止课堂教学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对大学教师或学生遭遇暴行迫害的抗议和迫使当局采取纠正措施的手段。有关此项特权如果曾经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话,那么今天肯定是找不到了。然就其表述的内容而言,也无法作为巴黎的教师大学或教师公会业已获得认证的依据。

至此为止,我们似乎依然没有发现任何严格意义上有关大学产生的文本依据。在13世纪初期之前,有一则信息,似乎也只有这一则信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巴黎教师行会业已存在的积极支持。根据圣阿尔班大修道院住持约翰尼斯·塞拉的门生马修·帕里斯对其老师的生平的传记性描述中,我们可以获知一位在巴黎求学的年轻人是如何进入“受选教师协会”的。约翰尼斯·塞拉院长逝于1214年,并“得享天年”。据此我们便可以推断他应当是在1170或1175年前后晋升为教师的。因此,在塞拉院长晋升为教师的时期,巴黎教师社群便应当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尽管其组织很可能并不明确,或者只是初具雏形。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著作中,大量记述巴黎学生生活的旧事,并且都是据其本人学生或教师身份的亲身体会。由于他对教师行会组织方面只字未提,因此我们不得不将巴黎大学的初现推移到13世